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文化价值论

代兴莉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沙 410081)

摘 要: 1919 年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在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它是梁启超晚年文化观改弦易辙的预告:一方面对西方物质和科技文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与 1919 年以前梁启超对待西方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又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推崇。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基本主张:偏于“中学”的调和主义路线。这既体现了梁启超思想中理性的和辩证的一面,又不免具有幻想的色彩。

关键词: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文化价值;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西融合

1918 年年底,梁启超携蒋百里、张君勱、丁文江等人,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为期 1 年的欧洲游历生活。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游览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地,对“一战”之后欧洲物质匮乏的生活有了亲身的感受,对欧洲科技文明有了新的看法,并将这些感受和看法凝结成了《欧游心影录》一书。此书在梁启超的文化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是其晚年文化观改弦易辙的预告:一方面对西方物质和科技文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与 1919 年以前梁启超对待西方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又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推崇。

一 晚年文化观“改弦易辙”的预告

在梁启超众多的煌煌巨著中,《欧游心影录》并不是篇幅很大的一部,其思想的份量也不是很重,既没有早期《变法通议》、《新民说》那么明显的政治影响和启蒙价值,也没有后期《墨子学案》、《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明晰的体系和厚重的学术含量,但这并不能就此论断《欧游心影录》在他整个的思想世界中没有地位。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它在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最终形成方面是一个重要的记号,它所包含的文化思想也是他晚年文化观“改弦易辙”的预告。总而言之,《欧游心影录》的象征性意义非常明显。

学界的一个共识是,梁启超的思想是“善变”的,它随着时势而不时发生转变,这一点梁启超自己也指出过,这与他的老师康有为的迂执显出了差别。而两次海外游历所体现出来的“善变”更是明显,一次是 1903 年的北美游历,一次就是 1918 年开始的欧洲游历。北美游历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发现了美国式共和制的弊端,认为美式共和不适合于当时的中

国,从而转为提倡君主立宪制。这种观念转变的直接结果是对“革命”不再抱有信任,认为革命只会导致中国内乱和可能的专制,所以走到了“改良”的道路上去,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分道扬镳。并创办《新民丛报》,与孙中山领导的《民报》展开了长期的论战。欧游也是梁启超一生中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如果说 1919 年之前的梁启超主要精力和贡献在政治参与和思想启蒙方面,那么 1919 年欧游之后的梁启超不再把自己的满腔热情投注在政治活动方面,而是致力于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典籍研究,从前期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和启蒙大师变身为教育家和学术大师。这种转变可从他 1920 年 3 月 25 日写给梁思顺的信中看出来:“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1]904}在《欧游心影录》中也显示了这种征兆。《欧游心影录》的文化思想,大略言之,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既包括对西方精神中好的一面的肯定,更有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人的精神状况的批判,但更有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思想的想法,企图以此开出救治西方文明弊病的药方,走出一条中国文化建设的新路。正是这些想法的存在,决定了梁启超晚期的人生选择。

梁启超欧游的动因之一应该有排遣政治失意的因素在内。纵观他的一生,他对中国政治的失意、失望最明显的有两次。一次是 1908~1909 年间,因政治活动受挫,曾思专心著述;一次是 1918 年,因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政治荒唐剧接连上演,他对中国政治现状失去信心,直接促成了他年末的欧游。欧游对他的影响是根本性的,是颠覆性的。他在 1919 年 6 月 6 日致其弟梁仲策的信里就说道:“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1]881}他本抱着考察

收稿日期:2009-03-26

作者简介:代兴莉,女,湖南永兴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欧战”(即“一战”)之后果和学习西方文明之长处而去,却不想带着对西方文明之极大失望而归。政治不值得投靠,西方文明又不足信,所以欧游之后,他虽然仍旧难以忘怀于政事国情,依然写些政论性篇什,但基本上不涉足政坛上的实际事务,而是义无反顾地走上大学讲坛,从事文化传播的工作,走进中国传统文化,从事中国典籍的研究,对于自己生命中最后10年的生存来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改变,成为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和学术研究的卓然大家。虽然1919年之前,梁启超也有很多的文化学术论著,但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诸如《孔子》(1920)、《墨经校释》(1920)、《墨子学案》(1921)、《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以及佛典研究等,大多是在1919年之后完成的。或许这正是梁启超之幸,也是中国近代学术之幸。

二 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梁启超出游欧洲的一个目的是考察“一战”的后果。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梁氏是一位感觉最灵敏的人”。^{[2]89}“一战”刚刚开始,他就说这次大战对他有“至剧之刺激”,预告它将对世界(包括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确实,在20世纪之前,欧洲还从未发生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蹂躏了几乎整个欧洲战争。被飞机、大炮等现代科技成果所装配的“一战”不仅使欧洲人的物质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而且空前地颠覆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了对科技、理性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疾患比之物质的困窘,更是致命的。精神的怀疑、恐慌和绝望,导致了人们对物质文明的反思,对科技理性的批判,对自由、进步、启蒙等概念的清算,并因此有了20世纪持久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和虚无主义情绪的蔓延,种种悲观主义的哲学依次降生在20世纪欧洲的思想时空之下。笔者认为,黑格尔精致的理性主义哲学大厦的倒塌,也是可从“一战”恶果这一方面去寻找原因的。“一战”同样让20世纪初期的梁启超感觉到触目惊心,整个欧洲的破败、凋零在他的眼前展现出西方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极其脆弱的一面。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多次记载了遍及欧洲的物质匮乏情况,并认为“这场战争,真算是打一场倾家荡产的大官司。输家不用说是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枯腊。”^{[3]10}由此他对西方的物质文明的过度发展提出了担心。在伦敦历时,他写道:“在物质的组织之下,全社会像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停摆,那苦痛真说不尽。只怕从今以后,那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总有些变动罢。”^{[4]2992}

他对物质文明的质疑是印象式的,没有太多的学理成分,但他对科技文明和科学万能论的批判却显得细腻多了,深刻多了。他指出,科学发展不仅给人们外部生活带来急剧的变迁,也使人们的内部生活随之发生动摇,因为科学的昌明损害了精神所依的诸多支柱,如宗教、哲学、道德。随着科学的过度发展以及人们对科学的崇拜,“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被建立起来,‘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

认了’。”^{[3]19}如此一来,道德的自觉也就没有了人性的支撑。这不仅关乎道德标准的变迁问题,更抽空了道德之能否存在的根基。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出自于这一点。精神支柱的倾颓,必然使全社会的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的境地,同时享乐的风气和弱肉强食的观念被树立起来。至此,梁氏完成了对西方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这种批判及其所表征的对西方文明的置疑,对梁启超来说,是空前的,在欧游之前,他还从未有过这种激烈的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欧游之前,虽然他一直不曾有过全盘西化的绝对立场,但从求学于万木草堂开始,经戊戌变法,到寓居日本,他都是非常推崇西学的,着力于西学的译介和传播。他虽然从北美游历时期就对西学(比如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了初步的反思,但像欧游期间这种大面积的批判还未曾出现。

不过还是得看到,他在批判西学的同时,又对西学中许多的因素进行了肯定,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传统,既指明了它们可能具有的危害性,又解释了它们对建构中国人之精神的必要性。这种探讨的方式是辩证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他对西方科技的批判也并不代表他对西方未来的前途持悲观的想法,不表示他对西方科学精神的拒绝以及放弃中国要引进西方科技的基本立场。正如他自己所说,西方还有好的精神传统的一面,譬如它有“群众的文明”,所以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新局面一定会开创出来。他还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3]20-21}

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和推崇

梁启超在20世纪初多次出游国外,如檀香山、新加坡、印度、澳洲、加拿大、美国,但当时接触的主要是华人社会,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是浮光掠影的。加之当时西方文化之病态尚未显露出来,所以他心里更多的是认可欧洲文化之优越和中国文化之落后,他心目中的西方主要是想象的美好的西方。而欧游使梁启超有了一次亲近欧洲文化的宝贵机会,期间他参观了欧洲的许多地方,与欧洲各阶层有着广泛的交流,拜访了柏格森等当时欧洲风头正劲的哲学名流。正是通过近距离地了解当时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学和思想状况,使他于凋敝的物质世界和人们悲观的精神世界中发现了西方文明的危机,故此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西方文化充满美好的想像,反之,受到一些西方人的鼓舞,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自信和推崇。他记载了他和美国一个新闻记者的对话:

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去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援我们。我……当他是有意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3]25}

老实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他者”像是未经验

证的,因而必然具有盲目性。而梁启超则将别人的“他者”想像置换为自己的期待和信心,也是具有理想性和幻想性色彩的。

诚然,中国当时的政治是令人丧气的,中国的传统也是有弊端的,中国的国民性也是存在诸多缺陷的。譬如爱国精神不强,“只有冲动,没有情操”,^{[3]173}缺乏自立精神和法治意识,等等,对这一切梁启超并不讳言,并具有清醒的理性的认知。这是梁启超思想中辩证的正确的方面。同时,他沉浸于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整理,致力于墨学、儒学和佛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寓有对当时全盘西化的激进潮流进行纠偏的用意,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梁启超从来不是一个极端论者,对“中学”和“西学”的一贯态度是主张二者融合,所以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主张仍然是中西调和的路子,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中国的文明,又拿中国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只不过1919年以前他于二者中偏重西学,而此时他偏重的是中学,是偏于中学的中西融合,即他所说的“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3]157}他说:柏格森等辈“若能读唯识宗的书,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样,他们若能理解禅宗,成就更不止这样。你想!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会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沈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3]156-57}这段话对两种极端的文化论者都提出了批评,从学理而言,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梁启超也讲过后面的话:“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百万人,瞅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3]157}这种言论是情绪化的,带有盲目乐观的意味。

总体而言,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一方面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论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空前的推崇和乐观主义姿态。正是这两个“空前”,很清楚地说明了欧游之后梁启超为什么会走上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道路。至于谈到对他偏于“中学”的中西融合的文化建设思路的评价,则应从历史的语境和现在的语境出发来全面地进行。从当时的历史境况来看,他偏于“中学”的调和立场,确实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五四”是激进的容易走极端的青年占据主流的时代,也是旧思想之流毒尚很厉害,而新思想的进入犹恐太少的时代。而当尘埃落定,当我们告别那个激情年代,以理性去清理历史的时候,却会发现梁启超的文化建设思路,不能仅仅被视为一种中庸的调和主义,相反,它具有辩证的清醒的也是睿智的内涵,不但正确地指出了科学的弊病(实际是人的弊病),而且有可能纠正非理性的激情所造成的极端倾向。可惜,历史未能听懂梁启超的“声音”,所以他虽厕身“五四”这个辉煌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却未能像戊戌变法时期那样再次位居于时代的最前头。

参考文献:

- [1]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2] 夏晓虹.追忆梁启超[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 [3] 梁启超.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 [4]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骆晓会)